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中古史卷

本卷主编 单国钺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中古史卷

本卷主编 单国钺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中古史卷/伊沛霞, 姚平, 单国钺
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325-6225-1

I. ①当… ②中… II. ①伊… ②姚… ③单… III. ①汉
学—研究—世界—文集 ②中国历史: 中古史—文集
IV. ①K207.8-53 ②K2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1476 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中古史卷

单国钺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400,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225-1

K · 1489 定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系列由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China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赞助



总序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姚 平 译

1966 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 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年份。在那段时光里,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仍被普遍地称为“红色中国”(Red China)。虽然我的老师中有的曾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居住在中国,但我很明白我不可能有去中国的机会。

在 1966 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 19 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 (James Legge)、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卫德明 (Helmut Wilhelm)、威利 (Arthur Waley)、高本汉 (Bernard Karlgren) 等。此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 Major*)、《通报》(*T'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 年贺凯 (Charles Hucker) 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二千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

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957 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957 年)及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 1959 年)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反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份的变化。本系列各卷编辑将在各分卷前言中讨论相关课题研究中的变化(如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对宗教课题的渐趋关注等),但我想在总序中概括一下这四十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不言而喻,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 1966 年至 1971 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men 那时的教授们几乎全是男性)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之类不少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或 40 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 1949 年后留在美国的,还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

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倬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化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兵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70 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70 年代之前的二十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ers)，到了 70 年代，大学各系多已

① 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旨在加强大学的跨文化课程。

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为一个合适的职位等上好几年。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这套翻译系列中的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 China generation)。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 80 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 80 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进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中国研究生来美国时,正是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在 60 年代期间,社会史研究占绝对优势。许多社会历史学家非常钦佩法国年鉴派的理论,他们探索能了解贵族层以下的平民百姓生活的研究方法,并力图发掘以计量证明的史料。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何炳棣在 1962 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此书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它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至80年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已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选择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课题。同时,在历史学家选择和设计研究课题时,他们往往从理论(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理论)框架着手。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并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化大量的时间来对付史料阅读课,因此,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亚洲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从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渐渐倾向于申明它们的理论性判断和主张。

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趋向之外,中国研究领域本身也有不少动态性变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讨论会及讨论会论文集的巨大作用。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福特[Ford]、梅隆[Mellon]基金会等)认为中国研究领域需要额外的资助;而从1951年起,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在以后取名为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赞助下,积极鼓励学者们合作研究一些高优先性课题。当时有不少基金会赞助的中国史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几天,并以详细评点个人论文为主要形式。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类讨论会,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杨联升,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倪德卫,加大伯克莱分校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等。此外,一些美国以外的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会,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赓武等。

这种学者间合作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不久,美国学术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中的中国文明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的当代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接受

这一资助学术讨论会的传统^①，从而保持了讨论会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在 70 年代的十年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册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集并不以历史为中心，但其内容多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如妇女研究、城市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组织研究等。此外，每册论文集中至少包括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文章。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专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它应该是跨学科的。在这套丛书中，《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 年)和《明清时期的城市》^②(*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 年)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重大。从 1982 年起，中国联合委员会赞助的讨论会论文集陆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是该社中国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加大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已有 28 册，我们这套翻译丛书中有两篇文章来自加大中国研究丛书中最有影响的论文集之一——《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 年)。

参加这些委员会或各大学赞助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史学者组成学术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讨论会之外，他们经常切磋交流，相互阅读、评点手稿。在历史学界的其他领域里，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多被视为无足轻重，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益的反馈，而且还因为文章被收入这类论文集确保了他们有大量的读者。我们这套丛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最初就是在这类论文集中发表的。

中国史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汉学传统决定的：早几代的历史学家往往花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文学、政治、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特点：这个亚洲学中最有权威的学术团体每年召开年

① 这两个组织在 80 年代早期合并成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② 或译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60 年代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模式的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不过,至 90 年代,“区域研究”模式受到了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许多院系不再愿意招聘“中国政治学家”(China political scientist)或“日本经济学家”(Japan economist)。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在系里低人一等。大多数在社会科学院系教书的区域研究教授教的是公共课,他们每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教有关中国的课程。所幸的是,中国史教授们大多躲过了这场对区域研究专家的攻击。在历史系,教授们专治一个区域和一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原始资料及其相关知识。因此,自 9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成了大多数区域研究课程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得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四十年以来这一领域所得到的额外的研究基金。至少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成倍增长。我在 1969—1970 年期间准备我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学校对我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还应付过来了。时至今日,英语的历史期刊数不胜数,有些刊物还是中国断代史方面的,如《早期中国》(*Early China*)和《明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等(这两份期刊在我们这套翻译系列中占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专题著作和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也更趋频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生在准备资格考试时很少有试图看遍有关某一个朝代的英语著作的。所幸的是,综合性著作进展尚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出版项

目是集体合作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不仅是一套详尽的中国政治史,而且还分析性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史研究仍然受制于整个学术界和大环境的影响。从这套丛书的各卷目录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中吸引着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十分关注的。我想,对中国史研究中英语研究成果的趋向的回顾以及这套丛书的编辑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问题,如:身份标识(identities)及其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文化、民族、地区的界域,这些界域的重要性和它们的相互跨越性;以及本土视角(local perspectives)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二十年以来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造成了大学中中国史课需求量的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大学中国史博士点设立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

前言

单国铤

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可说源远流长。从 16 世纪末开始,西方知识圈子,首先通过在华传教士的关系,已不断出现有关中国国情和历史的书籍。诚然,无论是最早期的“汉学”(Sinology)著述,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著作,西方的中国史研究都无法避免或多或少反映出不同时代西方知识界(以至社会)对中国的情意结。但即使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在选题、研究方法以至读者取向方面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在学术无国界的前提下,要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史学家,新一代的学者不单只有责任利用最丰富的史料去厘清中国历史传承的脉络,还必须尽量参考和结集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成果来协助解说中国历史与世界史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的一册,本书的主要目的固然是把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研究介绍给读者。但在扼要讨论所收录文章之前,我想特别指出,本书的任务不单只是把有启示性或开拓性的论文翻译过来,更希望通过翻译,能把不同概念引申出来的问题突显出来。就以“late imperial China”这一个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被普遍应用的概念为例(关于“late imperial”一词的历史,可参看司徒琳[Lynn Struve]编《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4 年,序论部分;中译本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史译丛》第四辑),虽然在本册我们往往顺理成章

地把这个词翻译成“帝制时代晚期”或“晚期帝制时代”(但非“帝国时代晚期”),但很明显“late imperial”这一概念与中文著述里常用的“明清时期”或“元明清时期”是有基本的分别(简单来说,前者重点是放在社会经济转型而非朝代转变上)。我想说明的是,不论是“late imperial China”还是“明清时期”,每一个历史概念背后都有一套理论和假设。若本册所选收的论文能重新引起读者审视不同概念背后假设的兴趣,那我们的目的也可算达到。

本册收录了12篇近40年来北美学者有关中国帝制时代(尤其是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历史论文。当然,作为一本选集,本书不可能全面反映西方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各个领域取得的成果(关于妇女史、思想文化史及宗教史的研究,读者可参看本丛书其他分册)。但值得说明的是,本册收录的文章不单只在理论建构或史料运用上各有其启示性,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近年西方中国史研究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两个中心关怀。要了解这些论文的代表性,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中心关怀作一简要说明。

首先是关于时间(或时代)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固然一向有不同的断代方法,但总体来说,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传统史学主要仍然是以朝代(如唐、宋、明、清等)为基本研究单位。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虽然亦承继了这个以朝代为本的断代传统,但近几十年来,学者亦往往尝试从不同角度去划分中国的历史时代。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亦从政治、制度转移到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题目上。固然,朝代兴衰仍然是中国历史转变的重要因素,但在社会、经济、文化史等范畴,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时代,正如个别收录在本册的论文指出,不一定是与朝代更替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虽然近年西方学者已绝少再把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强套在中国历史上,但西方的中国史学家仍然要面对一个似乎无法避免的挑战,即如何把中国的历史时间与西方(主要是欧洲)的历史时间作有启示性的比照。这一挑战的困难所在不是三言两语在一篇序论中可以说得明白的,但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西方的中国史学家对现在

常用的时代概念(如“medieval”[中世]、“early modern”[早期现代、早期近代、近代初期]、“modern”[近代、现代]等)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要跳出这个以欧洲历史经验为主体的断代框架,学者似乎仍需要在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方面作出新思维。

接着是有关空间(或地域)的问题。这个中心关怀可说有两个相关范畴。第一个是关于“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地域的定义。中国(无论怎样界定)不但幅员广阔,其版图亦因时而异。但历史上何谓“中国”这问题,在正统观念影响下,似乎并未在传统史学引起特别关注(关于中国传统历史疆界,可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1974—1976年)。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固然有受到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对不少西方学者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或经济个体,其实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产物。对他们来说,研究中国历史就是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实体在历史上形成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国家作为一个历史产物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可说已是一个共识;可参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我说[Verso]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有关地域的第二个范畴则涉及中国对外关系。在传统史学,中国与所谓外族(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的关系固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对许多西方的中国史学家来说,中国民族史、边疆史、对外交通史等不单只是重要的课题,更是要了解广义的“中国”的必经之路。对他们来说,研究中国历史其实就是要研究中国在文化、地域上的多元格局(借费孝通语;关于类似见解,可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著《开放的帝国》[*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诺顿[W. W. Norton]出版社,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

本册收录的12篇论文,有概论亦有专题研究。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年)在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

系》(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而最近期的则是韩森为其新著《丝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撰写的序论。本册可分为两部分,而每部分每两篇文章亦可自成一组。第一部分两组四篇文章,性质和读者对象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理论层面上都直接反映了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时与空的中心关怀。第二部分四组的八篇文章,其编排一方面是考虑到时代的先后和分布,另一方面则考虑到文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下让我对每组文章作一扼要的介绍。

本册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年)著《中国历史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和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著《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两篇各具规模的文章为起首。前者载于《亚洲研究集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4卷(1985年)第2期,原为施氏在1984年度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所发表的会长演辞。对本书的读者来说,施坚雅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施氏的本行虽然是人类学,但从其最早期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著作开始(如《泰国的华人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7年),他的学术就一直和历史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其众多著述中,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大概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及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亚洲研究学会,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及其编著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中华书局,2000年中译本)。前者施氏在应用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的同时,亦引用了大量史料和数据来分析近代四川地区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他指出,至少在四川地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包括物资和资讯的流通)和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帝制晚期的城市》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施氏为该书撰写的五篇论文(共超过200页)其实已有一

部专著的雏形。五篇论文不但材料丰富,引申的问题亦相当广泛,其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分布以至兴衰,往往须从区域系统(甚至宏区[macroregion]系统)的角度去分析才能完全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可说是集施氏个人研究大成的一篇巨著。虽然文章篇幅不长,但通过其宏区理论,施氏不但尝试解释个别宏区的结构和发展周期,并借着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步伐来说明,要彻底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学者不但须从宏观角度去审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还必须细心检视区域之间发展的差异及其相互间调适的过程。尽管学者对宏区理论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施坚雅对中国历史上时(发展周期)与空(区域系统)的反思,影响无疑是既深且远。值得一提的是,直至他2008年秋去世为止,施氏仍以80多岁高龄一直埋首有关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结构》虽然已是20多年前的著作,但为了本册的出版,施氏不但亲自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补,还特别利用新的数据重新绘制出三幅地图。施老对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确实是学者的典范。

狄宇宙《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一文,原载于《世界史学报》(*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0卷(1999年)第1期。狄氏的专业虽然为内亚历史,但内亚族群与中国历朝的关系一直是其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狄氏的学术有几项特点:第一是他在内亚史和中国史研究两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他不仅是新近出版《剑桥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的编辑之一,亦是《剑桥中国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撰稿人之一)。第二是其研究范围是从古代(如《古代中国及其敌人》[*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直延伸至清代(如《17世纪中国一个满兵的日记》[*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My Service in the Army," by Dzengšeo*],绕梁[Routledge]出版社,2006年)。第三是在史料运用方面,狄氏不但能够利用多种语言(包括蒙古文和满文)的文献,还往往